



## 人类发展状况批判与人学主题的确立

<http://www.firstlight.cn> 2010-03-30

人学的自觉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哲学研究的重大成果之一。经过80年代关于异化和人道主义、中国传统文化、认识的本质、哲学体系改革和哲学观念转变等重大理论问题的讨论,90年代的中国哲学研究开始把理性的目光投射到人本身,对人的存在进行总体性的反思,由此形成自觉的人学形态。特别值得指出的是,目前中国的人学研究已经超越了对人的本质的一般的、形而上的纯理性反思的层面,开始在现实的文化转型之中,在新儒学、后现代主义和现代化文化精神的冲突之中去揭示人的生存方式和文化模式的现状及其转型机制。这种关于人之存在的文化哲学视野十分重要,因为人是什么的问题只有人的生存方式和文化模式及其转型与演化才能说清楚。

进一步说,人学研究的这种文化哲学视野不仅对于揭示人的本质具有重要的学理价值,而且对于推动中国传统文化模式的转型和人自身的现代化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断言,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人学承载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的重要使命。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指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民素质的提高和人才资源的开发。面对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和综合国力剧烈竞争,面对世界范围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面对小康社会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全党必须从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和民族振兴的高度,充分认识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应当看到,文化建设任务的提出抓住了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中国社会发展的关键的一环。这是因为,中外现代化的历史经验表明,以工业革命、市场经济和科技革命为表现形态的现代化并非是简单的经济增长和技术发展的问题,而是代表着人类社会由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世界历史性的转变。因此,现代化必然涉及人和社会各个主要方面的变化,它是一个总体性进程。从大的方面着眼,统一的现代化进程主要包含两大方面:一是以经济起飞、技术发展、体制完善等为主要内涵的社会层面的现代化;一是以素质提高、生存方式和文化模式转型为主要内涵的人自身的现代化。显而易见,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所提出的“国民素质的提高和人才资源的开发”的任务,从最根本的意义上讲,就是以文化转型为核心的人自身的现代化,即中国民众由凭借经验、传统、习俗、情感而生存的自在自发的传统主体,向凭借理性、规则、法制而生存的自由自觉的现代主体的文化转型。这正是转型时期中国人学研究的根本任务和主题。

为了真正确立中国人学研究的文化转型和人自身现代化的主题,使中国人学研究真正承载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的使命,我们必须深刻地分析和批判人类的发展状况,尤其要深入探讨人类发展状况在中国社会背景的特殊表现。这是因为,虽然任何知识都直接或间接地包含着对人的存在的自我意识,但哲学并非在任何时刻都意识到或自觉到自身的人学内蕴。实际上,人学的自觉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一般说来,每一时代人学研究主题的确立都同该时代人类发展状况直接相关。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人学的自觉的过程是以人类发展状况的相对成熟为背景的。

人类发展状况无疑体现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如社会生活的民主化程度、法制化程度、理性化程度等。但从最深刻的意义上讲,衡量人类发展状况的最根本的尺度应当是历史主体的生存方式和内在素质,即文化模式。应当指出,迄今为止的人类实践发展表明,主要有三种基本的生存方式或文化模式决定着人类的不同发展状况。(1)自在自发的生存模式。自在自发的活动是最基础或最低层次的人的活动,它往往最典型地表现为衣食住行、饮食男女等日常活动,是由重复性思维、传统习惯、给定的图式和规则自发地维系的一种自然而然的实践活动,具有自在性、自发性和重复性的特征。(2)异化受动的生存模式。马克思曾详细地探讨过现代社会的异化劳动现象。这种劳动对人而言具有外在性、强制性和异己性。在这里,构成人的本质的自由自觉的对象化活动和文化创造扭曲和蜕变为一种外在于人的被迫的和强制的活动,一种外在的异己力量。(3)自由自觉的生存模式。自由自觉的创造性的实践是人们通常所理解的真正意义上的人的实践,它以自觉的和清晰的方式展示出人的本质性的存在方式,是人的最高的和最发达形态的文化模式。可以说,正是上述三种基本的文化模式的不同发展程度和不同的交互关系决定了人类不同的发展状况。对此,我们可以稍做具体的分析。

一、20世纪人类的一般发展状况。20世纪的人类发展状况呈现为一种成熟的状态。所谓成熟,并非指完善完满,而是说人的上述三种基本生存方式或文化模式依次在历史进程中展示出各自的内涵,并以一种相互制约,甚至相互冲突的方式展现出人的生存的丰富的和多维度的内涵,从而推动着人学研究走向自觉。在漫长的农业文明,占主导地位的是凭借经验、传统和情感而活动的自在自发的文化模式,人处于一种不发展的状态。相应地,那时的哲学常常忽略、漠视,甚至敌视人的本质,而把周围世界当作一个与人的本质和人的活动完全无涉的实在加以剖析,从而建构各种非人的或超人的哲学知识体系。而在工业文明和市场条件下,科学技术的进步、生产力的发展、世界性交往的扩大,为人的超越本性和创造本性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充足的空间,使人超越了传统的自在自发的文化模式,人的自由自觉的创造本性以及人的社会历史同人的活动的本质关联开始展现出来。这是人类发展

的一种相对成熟的状态。同时,20世纪人类发展状况的成熟也通过人的主体性活动的负面效应表现出来,自由自觉的文化模式被异化、物化,人与自然关系的破坏、人与人关系的疏离等否定性现象和被异化的文化模式相伴随。这从一个侧面展示了人的发展进程的曲折性和开放性,以及人的存在内涵的丰富性。正是在这种复杂的背景中,产生了以弘扬人的理性本质和主体性精神,超越人的异化状态为宗旨的各种人学理论。

二、人类发展状况在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特殊表现。目前,处于现代化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正以浓缩的方式集中地反映出过去相当长一段历史进程中的人类发展状况的演化,它使人的自在自发的、异化受动的和自由自觉的文化模式以相互冲突的方式共时地影响着中国民众的行为。一方面,我们正经历着传统农业文明的自在自发的文化模式同现代工业文明的自由自觉的文化模式的冲突与碰撞。中国有着十分漫长而又成熟的农业文明,儒家和道家所代表的农耕时代的“天人合一”的和伦理中心主义的文化精神,以及重复性的和自在自发的传统日常生活结构与图式塑造了中国民众倚重经验、习惯、常识和宗法血缘关系的自在自发的文化模式。当市场经济建构走向深化时,这种传统的文化模式就同现代工业文明所要求的理性的、法治的、自由的和创造性的文化模式相冲突。这种文化冲突表达出现代化的深层次要求,即由自在自发的经验式活动方式向自由自觉的理性化活动方式的文化转型,这也就是要求人提高素质,成为自由自觉的和成熟的现代化主体。另一方面,我们又经历着工业社会自由自觉的理性化文化模式的危机和人们对这种文化模式的批判。中国的现代化是在世界的大文化背景中展开的,它不可能不受整个人类历史进程的影响。当我们终于在市场经济建构过程中选择工业文明的自由自觉的理性化文化模式,去取代我们传统的自在自发的经验式文化模式时,我们又不得不同人类社会一道经历着理性化文化模式的困境。应当说,在20世纪,人的理性的和创造性的文化模式依旧通过社会生产率的提高、科学技术的进步等来展示自己的本质力量,但它同时也陷入了深层的文化危机和文化冲突。日益加深的人的异化和物化的生存困境、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的破坏等,开始展示出工业文明的理性文化精神的局限性和内在缺陷。于是,便有了后现代主义对工业文明的文化批判和生态哲学对理性文化的反抗。这样,我们面临着很矛盾的历史任务:在建构自由自觉的理性化文化模式的同时就要考虑对它的批判和修正。

三、中国人学研究主题的特殊定位。从上述可见,我们必须在中国的文化转型和发达工业社会的文化冲突这双重文化背景上,在人的自在自发的文化模式、异化受动的文化模式和自由自觉的文化模式的相互冲突中来确立中国人学研究的主题。这就使得中国人学研究的使命和任务异常沉重与艰巨,但它同时可能造就中国人学研究的成熟与丰富。具体说来,中国人学研究承载着双重使命:一方面它应成为工业文明所要求的理性的和创造性的文化模式的催生剂,另一方面又要努力成为现代理性文化的局限性和弊端的解毒剂。换言之,以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转型为核心的人学研究有着很高的期望值,它将促进并寄希望于中国民众在文化转型中实现自身的现代化,成为自由自觉的、理性的现代主体,但又不要由于个体主体性的过分发达而使自己陷入异化和物化之中。显然,中国现代化的命运依赖于20世纪文化背景中更加成熟的现代中国公民的生成,而这一复杂的目标和主题将使中国的人学研究展现出非常宏伟的前景。

[存档文本](#)